

王梦恕：

我从不看领导脸色讲话

在北方交通大学隧道中心三楼，76岁的院士王梦恕的办公室并不大，墙上挂着《沁园春·雪》的书法作品。王梦恕的名片非常普通，黑白印刷，头衔有四个，分别是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北方交通大学教授、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。这次专访，更像是一次聊天，一位经历过世事沧桑的长者谈自己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语言平实，一如其人。



因为敢说真话，王梦恕经常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。(资料片)

本报深度记者 王海涛

高铁出口最大障碍是如何置换能源

齐鲁晚报：中国的高铁正在走出国门，您认为高铁出口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？

王梦恕：最大障碍是如何实现平等交换，我们要通过高铁技术置换能源，挣外汇没有用，用能源来换比较合适，谈妥了就可以。

再一个障碍是很多国家很重视就业问题，我们去一个人能带动当地10个人的就业，我国的高铁建设人员还要负责当地人员的培训，建设工地用当地人干活，带动当地就业，但一些地方的劳动效率太低。还有一个因素是有些出口国家的政治不稳定。

我们在高铁上的谈判很硬，没有迁就，要修必须用我们的标准、技术和设备，这也是让中国自豪的，高铁代表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，所有设备都是国家自己生产的，没有一分钱的专利费，不像汽车行业，一年一万多亿的专利费跑出去了。

齐鲁晚报：目前我国铁路运输方式还需要做哪些调整？

王梦恕：公路运输是我国目前主要的运输方式，但能源浪费很大，应该逐步改变。将来，货运特别是煤的运输，不应该允许汽车运煤，用优质的油拉低质的煤是最不合算的。火车和汽车运输成本做过对比，1吨煤运输1公里，火车需要16分钱，汽车则需要6毛钱。

美国铁路总里程是27.2万公里，主要以货运为主，从节约能源的角度出发，绝对不会主要用汽车来运物资。我国现在铁路总里程才10万公里，到本世纪末才能达到28万公里。

齐鲁晚报：能源是我国的一个短板，加强铁路建设是弥补的一个举措吗？

王梦恕：加强铁路建设是完全必要，现在煤、油、气用量很大，一年用煤约40亿吨，现在火车运输只占到一半，将近20亿吨的煤仍然是汽车运输，这浪费了多少汽油资源？所以要加快铁路建设，铁路运输要以货运为主，包括重载货运。

招投标是易产生腐败的机制

齐鲁晚报：铁道部取消后，

对中国铁路发展有什么影响？

王梦恕：当时我就不同意，政企分家是错误的，铁路是半军事化的东西，没有铁路，国家打仗都打不了。

改成企业后，2013年，基本上没修新的线路，因为铁道部取消后，铁总没任务，以运营为主，以前铁路修建所有的贷款的账都给了铁总，铁总负债2.66万亿，按照6%的利息，一年利息1000多亿，这样就基本不修铁路了，给国家造成很被动的局面。要修的话，国家就得拿钱，作为企业，铁总考虑市场成本，修不修铁路也和我没关系，有钱我就修，没钱的话，谁拿钱我就给谁修。非让我修，我就修中东部，10年我就能把钱赚回来，绝对不修西部。

后来发现，由于不修铁路，钢铁行业很麻烦，机械设备也卖不出去，加上水泥、煤炭等，多个行业都受到影响。

齐鲁晚报：高铁投资金额比较大，涉及环节比较多，您怎么看铁路在招投标方面防止腐败的作用？

王梦恕：这个是大问题，当时刘志军上台后，把标压得很低，一公里造价到不了一个亿，长期低标施工，整个施工单位（各个局）欠账很多，要施工必须贷款，负债率达到80%以上。尤其是铁道部取消后，债务转给铁总，铁总手上真没钱。铁路设计预算和施工实际造价经常出现差异，由于地质条件复杂，实际施工费用超过工程预算的20%—30%，而国家规定不能超过10%。招标造价太低，施工需要补钱，这里面也容易牵扯腐败。关系好，送点礼，可能很快解决。如果关系不好，拖上几年不能解决，易产生“要钱腐败”。

招投标是容易产生腐败的机制，取消招投标就是最好的办法。没有招投标，大型企业就不会拉关系，编标书，很多技术人才不是用在真正解决技术问题上，而是用在拉关系、编标书上，甚至在标书上造假。国外在这方面基本没有招投标，给我干我就干，你招投标我也不参加。我们现在地地铁把一条线分成很多段，得利的就是甲方。现在有些地方搞BT建设，整个线路交给大单位，总承包，建完交钥匙，这样就避免很多腐败。深圳地铁就是这么操作的。

铁路建设的施工单位和其他行业还不一样，都是中央

企业，是国家管理的，应该让这些施工单位集中力量搞好工程建设，不要搞人际关系，不要浪费资源搞招投标那些形式。比如，我们搞航天，搞飞机制造都不招投标，都是国家分配，集中力量按照要求做好就可以。

铁路腐败还有一块就是“卖车皮”，因为铁路资源比较紧张，运量不够，今后加快铁路建设就能逐步解决。在全国范围内，我建议取消招投标，这是造成腐败的一个根源。

齐鲁晚报：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铁路事故？

王梦恕：当年温州“7·23”动车事故发生时，我反对说是因为技术问题，我认为事故是管理问题和责任问题。当时我这么说，压力很大，很多人说我没同情心，但这就是实事求是，不是技术问题而说成技术问题，让国家损失很大，当年一万多公里的铁路建设停了下来，损失几千亿，在国际上也造成了中国铁路不安全的负面影响。

有一年我去日本开会，有个对中国友好的日本教授说，“你们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国家，我们2007年有次火车事故死了100多人，是技术问题，我们定性为管理问题。你们的事故明明是管理问题，非说成技术问题。”

动车上都安装了自动避车系统，2公里红灯亮显示需要停车，4公里黄灯亮显示减速，当时雷击使避车系统一个保险丝烧掉了，换个保险丝就可以。但当时车上的管理和人员素质不行，没有及时更换，所以导致撞车。

院士不能只为小集团服务

齐鲁晚报：您是1995年中国工程院的第一批院士，有没有遇到一些诱惑和压力？

王梦恕：当时院士申报，铁道部报了20多个人，包括铁道部总工，我在评选中排名第一，主要工作是改变了隧道施工方法，最后申报成功2个，其中一个就是我。

评上后，好多学校邀请我，当时我在铁道部隧道工程局，工资不高。如果去广州那边，解决房子，每月补贴一万。我当时想，是铁道部和隧道局培养了我，工作特别需要我，我哪儿也不去。那时候我在洛阳工作，每月补贴500元，与广州一万元相

比很少，但我不是为钱，是以事业为重。

评选院士，品德很关键，不能拿院士当台阶达到个人目的。院士本身有很多责任，不是光为自己这个行和小集团的，要考虑国家一些大的事情。

齐鲁晚报：怎么看待外界对您的评价？

王梦恕：我平时说话比较多，在社会上的发言权也大，但从来不看谁的脸色讲话，真的就是真的，假的就是假的，很不客气。不管面对多大的领导，该说就说，这是我做人的标准。

对很多事情的看法，我一开始往往是少数派，但后来的结果证明我是正确的。我从不上网看他们对我的评论，没有那么多时间。武则天立无字碑任后人评说，我也有这样的胸怀，你怎么说我我还是我，任你评论。做人要物我两忘，宠辱不惊。刘志军在位时，我经常提意见，针锋相对，他下台了也不能因此否认高铁，不能落井下石，否认一切。

我从来就是很大胆的，当院士之前很多人感觉我这个人天马行空。当时改变隧道传统施工方法，阻力很大，我就按照我的方法做，结果做成了。这种情况下，领导是不太欢迎这样的人的，提拔我的时候，有不少人往上反映意见。后来评上了院士，铁道部有领导说，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。

齐鲁晚报：在大学里，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二者之间如何平衡？

王梦恕：工程院选院士主要不是看论文，交10篇就够了。以论文为标准是不对的，目前各校也在扭转，要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，包括品德培养都是很重要的。

在北方交通大学，评选职称坚持教学第一，还要看所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，研究项目只是一个内容。我不主张论资排辈，但在成果的基础上老人优先，避免评选时部门不团结的情况。以前教学和现场紧密结合做得很好，包括老师和现场结合，学生去实习都做得很多，现在大学都没钱了，不去实习了，不和单位联系了，这样不行。

我带过的毕业的学生有70多个，在各个岗位上基本都是骨干。一进校门我就和他们说，要有品德，要有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要忠孝仁义做人，求真务实做事。

上接B01版

然而，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土豆的营养价值如此丰富。施晓亮认为，“土豆低贱”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需全面转变。“0.25公斤的新鲜土豆够一个人一昼夜消耗所需要的维生素，特别是土豆中含有禾谷类粮食没有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，土豆还是一个矿物质宝库，各种矿物质是苹果的几倍至几十倍不等，特别是镁与钾的含量高，500克土豆的营养价值大约相当于1750克的苹果。”

施晓亮告诉齐鲁晚报记者，政府和企业要用十年或者更长时间帮人们认识到这点，“企业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大。”

“三家酒店的土豆宴就是要引导人们将这种观念转变过来。”施晓亮说，“现在中国所产土豆的约90%只能当做蔬菜用，顶多加工淀粉，加工全粉的土豆才是主粮。”

“希森集团在内蒙古等地有30万亩种薯种植基地，因为机械和人工收割导致很多种薯残破，我们就加工成全粉。”

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所长、农业部农产品加工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（北京）主任王凤忠告诉齐鲁晚报记者，“并不是在馒头中掺入土豆全粉就是主粮化，土豆全粉占到40%以上才算，这方面我国还有一些路要走。”

被看中的商机

“我国土豆亩产不高，与种薯未进行有效脱毒有关。用上优质的脱毒种薯，每亩增收至少1吨。每个土豆都带‘毒’，但不是影响人体健康的毒，而是影响叶片生长的毒——卷叶病毒、花叶病毒、外病毒等，感染后会影响块茎的产量和质量。”孔黎明对齐鲁晚报记者说。施晓亮认为，让全国一半的种植面积都能用上优质高产的脱毒种薯，按每亩增产1吨的最低值估算，一年至少能增产4000万吨，这对于农民增收增收、国家粮食安全都非常有意义。

在希森集团乐陵基地，挂有“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”的牌子，这一相当于袁隆平的“国家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”的研究中心，为何花落希森集团？主要源自希森集团董事长梁希森的兴趣。

很早就入选“胡润排行榜”的梁希森，名字并不那么出名，此前并未涉足土豆产业。1999年，北京玫瑰园别墅因经营不善被破产拍卖，梁希森收购后成为新主人，此后楼市回暖，这一选择使梁希森得以入选“胡润排行榜”。

就在房产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，梁希森将目光转向土豆育种。2001年，梁希森陪小女儿去肯德基吃饭，不经意地询问制作薯条的土豆是哪里生产的，对方一句“进口”的让梁希森产生一些想法。

梁希森随后查询资料得知，虽然我国土豆产量第一，但单产水平非常低，主要原因就是种子不行。在国外，都是由专门的机构来培育脱毒种薯的，梁希森觉得这是一个商机。

2005年，梁希森通过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找到山东省农科院研究员、土豆专家孙慧生。

孙慧生曾参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土豆育种，在山东农科院工作期间，育成适于山东省气候条件、对日照反应为中性的土豆品种系列：鲁马铃薯1号、2号、3号、双丰4号和5号品种，并引种鉴定推广了鲁引1号，其中鲁马铃薯1号1988年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。

孙慧生加大了梁希森的信心，梁希森后投入数亿元，在家乡山东乐陵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化土豆育种基地，2008年，又在北京延庆投资建设建立30万多平方米的第二个育种基地。

对于希森集团来说，最大的成就就是拿下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，这个中心2007年由科技部批准在希森集团挂牌成立，是全国唯一一家。

农业部土豆主粮化的消息，无疑给像希森集团这样的企业带来了利好。